

· 文學研究 ·

匆匆過客：西方文論 曾悄無聲息做客中國大陸(1957~1964)*

林精華

[提 要] 在冷戰中建立的新中國,實行“一邊倒”的戰略,文學批評方法中唯有以“馬列文論”之名的蘇聯反映論,民國時知識界曾擁抱過的“西方”則盡速消失。但在反右運動及其後七年的特殊環境中,居然問世了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伍蠡甫《西方文論選》等,尤其是袁可嘉負責選編的兩卷本《現代美英資產階級文藝理論選》。如此突兀事件發生,乃因斯大林去世,赫魯曉夫推動去斯大林化的解凍思潮、試圖緩和冷戰,卻導致中蘇論戰,中國由此意識到“一邊倒”的危險,便匆忙應對局勢,開始面對西方,於是西方文論再現於中國。但中國仍在蘇聯設定的國際共運框架下對待西方,而非建構自主的“西方”概念,導致這部文選發揮的實際效力微乎其微,且在文革到來前突然消失。

[關鍵詞] 冷戰 蘇聯的“西方” 西方文論 中國判斷

[中國分類號] I20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3) 03 - 0147 - 14

眾所周知,在冷戰中誕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自動地實施“一邊倒”的國際戰略。知識界終止了譯介歐美文藝藝術和批評理論這一持續半個世紀之久的傳統,民國年代那些有關歐美文藝及文學批評的譯作盡速消失,書店和大學課堂上所見的只是蘇俄文學及《文學原理》。這種情勢和 1952 年大學院系調整(取消民國效仿歐美大學建制,代之以蘇聯的大學模式)相呼應,自此歐美文藝批評在中國近乎銷聲匿跡。

然而,隨著反右運動展開,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朱光潛 1946 年譯作——克羅齊《美學原理》和《美學綱要》(1957)、柏拉圖《文藝對話集》(1959)等,他還受邀在北京大學講授並編纂《西方美學史》(1963 年上卷、1964 年下卷)、翻譯黑格爾《美學》(第一卷 1958 年);宗白華和韋卓民翻譯康德《判斷力批判》(1964);伍蠡甫受教育部委託主編《西方文論選》並能問世(上海文藝出版社 1963 年初版,人民文學出版社 1964 年再版);尤其是,中國科學院文學所學術七種輯刊之一的《現代美

*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現代文學意義生產與俄蘇文學關係研究”(項目號:22&ZD279)的階段性成果。

英資產階級文藝理論文選》(1962)——由 1946 年畢業於西南聯大外文系的袁可嘉負責主編。這部未列入“外國文藝理論叢書”的大型譯作,已觸及從歐洲文學批評向文學理論轉型的當代西方文論。它雖存在著若干核心概念翻譯不足問題——如把里德(Herbert Read)《文學之實質》譯成《文學批評的本質》、把柯林斯·布魯克斯(Collin Brooks)對華茲華斯詩篇進行高度技術化分析的新批評力作《論反諷》(Irony)譯成“嘲弄”、把美國社會學家弗拉德曼(Norman Friedman)《小說視點》(*Point of View in Fiction*, 1955)譯為《小說中的角度問題》等等,但它極有價值:諸多篇目被證實是西方文論經典;編後記睿智地指出,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 1961 年英美學院派文學批評,都是在引導讀者不關注社會現實,此乃西方文論區別於蘇聯反映論之標誌。

其實,新中國作為巨大的後發展國家,其文學家一開始若有條件知曉冷戰格局下的世界文學批評方法探索態勢,能加入這種探索過程,並把中國民族審美傳統融入其中,敘述冷戰進程中出現的各種重大文化藝術乃至思想事件,其成果的價值或許是其他國家所不能及的。因為無論西方學院派還是蘇聯意識形態領域都無視第三世界,哪怕雙方都不同程度地從知識上重視被殖民世界的文化,但皆無視其歷史或文明的主體性地位;批評界若正視中國歷史悠久和經驗豐富的文學批評及其現代轉型,從而坦然正視西方之批評方法,其意義不可低估。遺憾的是,正如中國文學發展遺失了傳統文化根基和現代文明之主體性那樣,文學批評也無緣知曉世界文學批評方法探索趨勢,更遑論及時參與其中。這也導致 1979 年後我們突然面對價值與不足並存的西方文論時,卻如獲至寶。

詭異的是,在禁止探討西方理論的極左時代,不被充分信任的學者袁可嘉和楊周翰等民國時代留下的文人,卻能翻譯並刊行上述這部厚重的《文選》,使“資產階級文論”不期而至;而如此重要的文獻對中國文學的教育、生產和批評實踐,卻未產生任何切實有益的影響,並在文革到來之前突然地悄無聲息地消失於中國。恢愴惱怪的冷戰過去 30 多年了,該如何正視這段歷史呢?

在二戰期間迅速崛起的美國和蘇聯,隨著戰事結束,就如何分配全球的戰略利益,開始在本土之外的世界各個角落開展競爭,如劃定三八線以對朝鮮半島分治。為了掩飾各自戰略意圖,並使其戰略利益合法化,分別構建了一系列宏大修辭,從而使競爭從國際地緣政治擴展到意識形態。這種情形迅速改變戰時蘇聯不禁止盟國文學的做法,1946 年 8 月 9 日聯共(布)中央組織局會議就《星》和《列寧格勒》雜誌發表措辭嚴厲的講話(批評它們刊發有“資產階級”、“反蘇維埃”傾向之作),一周後蘇共中央通過《聯共(布)關於〈星〉和〈列寧格勒〉雜誌》決議,對那些不排斥西方現代派的作家展開大批判,加速清理西方現代文學觀念在戰時蘇聯文學及批評中合法存在的跡象。蘇聯的做法在中國重演,除朱光潛翻譯柏拉圖《文藝對話集》(1954, 1956)外,很難見到歐美文學及理論。蘇聯這些突變有其要推動冷戰的根據:阻止西方現代派作品在蘇俄蔓延,在審美理論領域也不再延續和盟國合作的戰略,以強化反映論的唯一合法性、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正統性,便於斯大林體制掩飾二戰的慘烈代價和獲勝真相(美國租借法案)。但對急需繼續認識世界的中國而言,卻未必要跟著蘇聯的步伐,拒絕認識西方。

1953 年 3 月 5 日斯大林去世,迅速促成蘇共內部變化,醞釀出“解凍思潮”,意外地改變冷戰進程——要和美國緩和對抗局勢。這立即波及蘇中關係,使中國不得不重新考慮“一邊倒”戰略,也就使作為意識形態一部分的文藝學之格局需要調整,即出現本文開篇所說的重新引進西方文論。首先,蘇聯的變化使中國處理中蘇關係和其他國際關係問題的主體性判斷立即上升,“無產階級國

際主義原則”的重要性指數下降：1952年12月25日斯大林向美國記者表示，蘇聯願意同美國會談結束朝鮮戰爭問題，但私下卻促使毛澤東繼續堅持對美國的強硬立場；斯大林一去世，莫洛托夫重回外交部，便起草結束朝鮮戰爭報告，“形勢發展趨勢是，我們已不需要朝鮮人強加給我們的這場戰爭了”，貝利亞在對此也“表現出積極的姿態”。^①由此，1953年7月27日在板門店簽署《朝鮮停戰協定》，中國付出慘重代價之後，以回到戰前美蘇劃定的三八線狀態而終結。1954年周恩來參加多邊的日內瓦會議，提出並推動“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會間他交流的對象包括各類型國家，國家利益開始在中國外交中有所凸顯，似乎是從朝鮮戰爭汲取了教訓。是年7月7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的外交方針。

其次，蘇共內部變化使中國須重新思考蘇聯共產主義及其意識形態。1956年2月蘇共20大會議結束之際，赫魯曉夫發表《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報告，抨擊斯大林個人崇拜、破壞法治、在民族問題和對南斯拉夫關係上嚴重錯誤。這本是赫魯曉夫試圖鞏固權力、通過改變斯大林體制以緩和蘇美緊張關係，卻導致蘇聯內部出現反思斯大林體制的解凍思潮，社會出現改革、緩和冷戰的跡象。相應地，赫魯曉夫對中國做出更多務實性貢獻，以圖獲得承認其在國際共運中的領袖地位。蘇聯內政外交的變化，理論上對中國調整國際格局認知、反思國際共運、重建與蘇聯關係是難得的好機會。然而中國對斯大林去世之後蘇聯出現的變化做出負面理解，這就帶來不可調和的分歧。

第三，斯大林去世改變了國際共運進程。1955年9月蘇聯和聯邦德國建交，赫魯曉夫在和聯邦德國總理阿登納會晤時居然說中國人是黃禍。在毛澤東看來，此事肇始了中蘇分歧。^②1956年波匈事件，顯示出蘇聯陣營的國家間關係並未因共同的意識形態而穩固，蘇聯發表《關於發展和進一步加強蘇聯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友誼與合作之基礎的宣言》承認這方面錯誤，這就導致蘇共與中共在國際共運中領導與被領導關係在事實上難以為繼。對中國如火如荼的人民公社化運動，蘇共未發表肯定或否定意見，但針對蘇聯集體農莊效益不佳，而蘇聯和東歐不少民眾看好中國人民公社，有的人甚至希望蘇聯集體農莊也學習人民公社，《真理報》發表《赫魯曉夫談蘇聯過去的公社》（1959年7月1日），檢討1920年代蘇聯集體化之教訓，否定歷史上的極左運動。此舉激怒廬山會議之後的毛澤東，他視之為赫魯曉夫否決人民公社運動。而此前（1958）蘇聯提議在中國建長波電台和聯合艦隊，以換取中國所希望的核武器及核潛艇，毛澤東警覺地提出中蘇各出一半資金、蘇聯提供全部技術，長波電台主權屬於中國，被蘇聯拒絕；對組建聯合艦隊，即便蘇聯答應向中國提供潛艇技術，毛澤東仍視為是蘇聯企圖軍事控制中國，因中國當時海軍薄弱沒有能力共享蘇聯海岸線，從而斷然拒絕。對此，赫魯曉夫歎曰，“北約國家間在互相合作上不存在任何困難，而我們竟連這麼簡單的一件事也不能取得一致意見”。^③1959年6月美蘇談判禁止核試驗，蘇聯隨之停止援助中國核項目，中國指責蘇聯在西方面前退縮，中蘇兩黨論戰由此公開化為兩國分裂。1959年9月15~28日赫魯曉夫訪美後，到北京參加新中國十周年慶典，借用和美國總統會晤之餘熱，掩飾美蘇要調整冷戰策略意圖，讚賞美國緩和冷戰的舉措，指責中國反美、處理中印關係之“冒險主義”。

蘇聯內部變化和中蘇兩黨紛爭，促使中國意識到“一邊倒”戰略隱含著嚴重問題，便重新檢視意識形態。從陳獨秀和瞿秋白等由共產國際而轉向中國認同、到踐行斯大林主義的王明路線不敵有中國意識的毛澤東思想，表明中共相當一部分人具有中國情懷。本來就未必排斥美國精神的毛澤東，^④曾連續幾年於美國的國慶日在《新華日報》發表社論《民主頌——獻給美國獨立日》（1943年）等，盛讚美國的自由民主和人權。正因有如此意識，面對影響中蘇關係的蘇聯內政外交變化，1956年1月14日中央舉行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周恩來報告稱“既不能無限期地仰賴蘇聯專

家,更不能放鬆對蘇聯和其他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進行最有效的學習”。^⑤1960年5月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說,“中蘇關係,時好時壞,反復無常,1954年還比較好,1956年就不行了,1957年好一點,1958年又不行了,就是這麼反反復復,不好相處”,1960年1月7~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基本上確定了“努力主動地在外交上開創新局面”。^⑥尤其是,為慶祝新中國建立十周年,劉少奇給《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雜誌撰寫長文《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勝利》(1959),雖然說“蘇聯、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一起,結成了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在歐亞兩洲結成一片、團結友好的社會主義大家庭”,但具體論及新中國十年“偉大成就”則完全不提蘇聯;宋慶齡《中國的解放——中蘇友誼——人類向未來的躍進》雖讚賞蘇聯取得科技進步(登月)、社會主義國家有著共同的馬列主義價值觀,認為中蘇兄弟合作的政治意義在於,“中國的勝利,使社會主義陣營在一片擁有九億多人人口的遼闊土地聯接在一起;也使得歐亞按一種新型的民族與國家之間關係的結合,這種關係是建立在馬列主義理論基礎上的”,但讚賞冷戰緩和的“意義重大的決定”——赫魯曉夫和艾森豪威爾即將互訪,“世界輿論熱烈歡迎這個改善蘇美兩大國的政治關係的行動。人們認識到,這個行動對進一步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和促進世界和平事業一定會是有益的”。^⑦其他謳歌所在行業、領域和地方建國十年偉大成就,如郭沫若《科學戰線上的巨大勝利》、聶榮臻《十年來我國科學技術事業的發展》、沈雁冰《新中國社會主義文化藝術的輝煌成就》等等,皆不提及蘇聯,雖然這十年中國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皆受益於蘇聯的援助或幫助。進而,1965年國務院批准本年度向資本主義國家派遣50人學習自然科學,開新中國向西方國家派遣留學生先例。

在此情勢下,文藝理論也就適時調整,增加西方文論以降低蘇聯文論影響力:1958年就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中國的翻版“革命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展開討論,就出現批評這種方法是把文學簡單化的聲音;第二年就蔡文姬及《胡笳十八拍》展開論爭並引發的現代詩歌形式討論,提出客觀上需正視歐洲文學批評方法;第三年就“文學共鳴”和山水詩討論,涉及中國傳統文學及批評經驗。這些討論過程顯示出,新中國的文學理論和批評方法存在著嚴重不足,只學蘇聯文藝學的態勢需改變,須放開眼界關注蘇聯所反對的西方文論,並要正視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經驗。由此,1958年12月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與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合作組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叢書”、“外國文藝理論叢書”、“外國文學名著叢書”編委會,巴金、錢鍾書、朱光潛、季羨林、李健吾、樓適夷、楊憲益等任編委。1960年,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指出,“我們的理論工作還很薄弱也是事實”,為此中宣部聯合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在中國人民大學培養三屆文藝理論研究班(1959、1960、1961),“想改變理論薄弱,包括文藝理論薄弱的狀況,所以我們對這個文藝理論研究班是寄予希望的”。^⑧這樣一來,那些仍留在大陸的民國時代最重要海歸和一流作家,也就有機會重操舊業,給這些學員上課,如朱光潛能參訪大江南北、積極參與美學大討論(1957~1962年並集結六冊《美學問題討論集》)、再版舊作、翻譯黑格爾《美學》,還受中宣部委派給中央黨校講三個月西方美學史,甚至調往北大哲學系講授並編纂《西方美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上卷、1964年下卷),當時還附錄有《西方美學史資料附編》——從古希臘到20世紀初經典美學家的觀點及相關資料,讓中國讀者知曉了歐洲文學批評的基礎知識。與此同時,東吳大學教授吳獻書譯作《柏拉圖之理想國》(1920)被重印(北京商務印書館合集一冊,1957)、北大教授殷葆琛譯《安諾德文學評論選集“評荷馬史詩的譯本”及其他》(1958)、羅念生譯亞里士多德《詩學》(1962)、宗白華翻譯《判斷力批判》(上卷,1964)、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並翻譯溫舍特和柯林斯·布魯克斯的《文學批評中的神話和原型學派》(1964)等。

二

就是在這種情勢下,那部《現代美英資產階級文藝理論文選》(1962)得以問世。

編後記概要介紹了20世紀歐美文學批評歷程:從韋勒克《二十世紀文學若干批評主潮》(《耶魯評論》第51卷,1961年)開始,首先重點論述艾略特和瑞查茲等人的新批評,包括艾略特重視傳統的“非個人化”之有機形式主義主張、瑞查茲重視詩歌想象和結構的修辭哲學、從利維斯主辦的《細察》(Scrutiny)和著作《小說與讀者》(1932)到美國“南方學派”——蘭塞姆《新批評》(1941)及柯林斯·布魯克斯“反諷”論、艾倫·泰特(John Allen Tate)“詩之張力說”等。

其次,介紹和述評心理分析流派,包括弗洛伊德關於藝術起源於作家受到壓抑而進入潛意識的本能慾望,在“享樂原則”(pleasure principle)和“現實原則”(reality principle)之間遊移的學說,認為文學批評家里德的《文學之實質》(1950)廣泛運用本我、自我、超我之說,解釋浪漫主義何以不同於古典主義;對榮格關於集體無意識的神話儀式批評也重點討論,涉及榮格《分析心理學和詩歌藝術的關係》及其影響了諸多批評家,包括牛津大學教授默里(Gilgert Murray)《論保存在希臘悲劇中的儀式形式》(1912)和《詩歌中的古典傳統》(1927)等,康奈爾大學教授普拉斯考特(Frederick Prescott)《詩與神話》(1927)、英國古典學家和批評家博德金(Amy Maud Bodkin)《詩歌中的原始模型》(1934)關於文學上反復出現的主題和形象、菲爾拉特(Philip-Wheelwright)《燃燒的泉源:象徵主義語言研究》(1954)關於有深度的語言論神話乃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

第三,特別重視美國的文學批評,包括從美國新批評理論家范·魏·布魯克斯(Van Wyck Brooks)的評論集中輯錄《美國的成年》(1915)、《文學與領導》(1918)、《美國批評運動》(1932)、《創造者和發現者:美國作家的歷史》(1936~1953)及《美國作家》(1953),分析美國文學和社會問題所提出“民族文化”概念,還有著名文化批評家門肯(Henry Mencken)——他主編的《美國信使》雜誌和著作《偏見集》等強調美國民族文化,認為這些自由派批評代表了反傳統趨勢。其間,對和自由派相對立的新人文主義派也重點介紹,涉及哈佛大學教授白璧德(Irving Babbitt)以“人的法則”反對“物的法則”,以及著名文學編輯穆爾(Paul More)關於法國和美國現實主義、自然主義文學如何表現人的生物性之論,渲染真正藝術家要表現人性中的高貴理性。

第四,大量觸及西方關於小說敘述技術問題的文學批評,包括著名作家和批評家亨利·詹姆斯《小說的藝術》論人物客觀敘述和敘述者受限問題,英國著名作家和批評家盧伯克(Percy Lubock)《小說技巧》(1921)關於敘述視角問題,英國小說家和批評家福斯特《小說面面觀》(1927)關於小說敘述視角轉移以及如何區分性格穩定或單一的扁形人物形象、複雜多變的圓形人物等論述,伯克利加州大學教授肖勒(Mark Schorer)的《技巧即發現》(1945)關於小說寫作技術核心在於有獨到發現等論述。

第五,敏銳觸及1929年經濟危機之後出現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批評,包括美國激進左翼批評家喬治·高茨(George Goetz)的《美國文學的解放》關於美國文學衰落乃中產階級衰落的反映、美國文學出路在於依靠無產階級集體主義之論;1930年代美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希克斯(Granville Hicks)《批評之危機》(1933)提出“完美馬克思主義小說”論,而《偉大傳統:對內戰以來美國文學的一種解釋》(1933)認為代表美國文學偉大傳統的是,揭露社會現實問題的惠特曼和馬克·吐溫,而非頹廢派作家;屬於“准馬克思主義者”的艾德蒙·威爾遜(Edmund Wilson)《馬克思主義與文學》(1937),還有詩人和批評家考萊(Malcolm Cowley)之抒情回憶錄《流亡者歸來》(1934)、1940~

1950年代左翼批評家和哈佛大學教授麥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不負責任者》(1940)、哈佛大學教授馬希耶遜(F.O. Matthiessen)《批評家的責任》(1949)、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教授列文(Harry Levin)《文學是一種機制》(1946)等,皆主張文學家與社會保持密切關係。

第六,觸及剛沉寂的芝加哥文學批評學派——1930年代芝加哥大學英文系一批學者和批評家用亞里士多德詩學方法,對正方興未艾的新批評展開反批評,反對新批評把語言和詩歌用語視為最為重要的文學要件。他們強調文學客觀性和批評證據,如同亞里士多德那樣著眼於把文學作品當作整體結構,而非只強調語言複雜性,認為反諷和形象語言(figurative language)僅是文學結構中的元素。這個持續到1950年代的新亞里士多德學派,奠基人和代表克蘭(Ronald Crane)的《古代和現代批評家和批評》(1952)深入論述從亞里士多德到18世紀的歐洲文學批評,注重文學情節構成問題,認為文學批評乃說理的表述,由術語、命題、論證組成,由批評家確定的論題和方法所決定。編者對這些批評流派評價甚低,認為“新人文主義是清教徒傳統,歷史學派是過去的歷史社會學派,芝加哥學派沿襲亞里士多德方法,自由主義學派則發展了浪漫主義和印象主義批評。新批評新在關於詩歌語言的見解和文字分析方法,心理分析學派的一些新假設借用精神分析和人類學,科學性大有問題……各派分析與形式主義傾向有聯繫,抽象、繁瑣”。^⑨今天我們欽佩的是,編者在滿足時代意識形態所需之表述的同時,睿智地呈現了西方文論的部分真相。

按這等編輯思路,袁可嘉從這兩類文獻中選材:其一,把歐美文學批評或文學史知識化的著述,包括時任芝加哥大學教授扎貝爾(Morton Zabel)《美國的文學觀:20世紀美國批評的地位、方法和問題》(1931, 1951)、以研究美國民間文學而著稱的芝加哥大學教授布萊爾(Walter Blair)《美國文學》(1953)、杜克大學教授卡迪(Harrison Cady)《美國文學的成長:批評與歷史考察》(1956)、美國文學批評家海曼(Stanley Hyman)《批評的性能:當代美英文學批評選》(1956)等;其二,瑞查茲《文學批評原理》、燕卜遜《含混的七種類型》等經典批評家的力作。在這兩類文獻中,英國新批評得到了特別重視,包括意象派批評之父托馬斯·赫爾姆(Thomas Hulme)《論浪漫主義與古典主義》,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傳統與個人才能》、《批評的功能》等。

因譯者普遍有深厚的歐洲文學批評修養,整體上能把極為複雜的批評術語或概念準確翻譯出來:曹葆華如是翻譯艾略特《文學與現代世界》(1935),“人(person)既是具體的個體(individual),又是社會成員。人的個性獨一無二,不可侵犯,但他生來同樣是社會成員。當社會被設想僅僅是個人的總和,你就會看到自由民主的混亂情況。當人完全屈從於社會,你就會看到法西斯主義或共產主義使人喪失人性。不過,這兩個極端是可以組合的。因自由民主主義真正所承認的不是人的總和,而是個人的總和,這就是說,不是人的多樣性和獨特性,而純粹是舊式的或原子化的物質性個性化,這是對人的不尊重。因為人如果脫離社會,就不再是一個人;社會若不包括個人就不成其為社會。人除非是一個社會成員,否則他就不是他自己”,“對社會正義的熱情本身最終證明是不夠的。我稱為現代末世論的危險,即忽視永恆的東西而重視暫時的東西、忽視個人的東西而重視社會的東西之危險,就是詩人和其他每個人共同遭遇的危險”。^⑩

令人欽佩的是,面對歐美的學院化批評開始壟斷大學英文系和比較文學系課堂之大勢,這部文獻能重視傑出詩人艾略特的詩歌批評經典文獻,並準確翻譯出真諦,是極為可貴的。更有意義的是,本文選特別重視英國新批評,包括著名文學批評家昆西·利維斯(Queenie Dorothy Leavis)《閱讀能力》這一堪稱新批評經典篇目。它乃利維斯在新批評奠基人瑞查茲指導下完成的博士學位論文基礎上所成就的力作《小說與公眾閱讀》(1939)之第3章第2節,論述當時公眾閱讀水平下降問

題,認為用情節、人物、背景、主題、動作等抽象概念討論小說是徒勞無益的,若著眼於人物,那就要求長篇小說的價值在於塑造人物形象的栩栩如生;若關注主題或題材,就會認為威爾斯比亨利·詹姆斯或奧斯丁更偉大,因威爾斯小說觸及的方面更多,而詹姆斯僅僅觸及人類的激情而已;若重視情節,《呼嘯山莊》、《克拉麗莎》和黛爾的小說一樣古怪。^⑪還從利維斯《共同的追求》(1942)中輯錄了給倫敦經濟政治學院學生會的演講《文學與社會》:“文學研究(不是學院式的研究)與其有關並重要的地方是,考慮到政治和社會事務,此舉應由一些受過真正文學教育的人去做,而且要在充滿具有活力的文學文化的環境中展開……文學對社會學家或其他人也會提供將文學作為文學而研究時才能提供的東西……任何人都能讀小說,小說能用作社會學或其他方面的例證,似乎也證明了這種看法。其實,要把那種最有意義、提供內容最多的小說用作證據或說明,是非常需要技術的,它是訓練的結果,但幾乎沒有社會學家受到這樣的訓練。社會學家若不遇到更有才智的批評家,就不能知道勞倫斯對現代文明人的問題,究竟有些什麼指導;社會心理學家若不是由於批評分析的經驗和習慣而變成敏感、獨創的批評家,他就不會知道康拉德關於個人現實的社會性研究究竟教導了我們什麼。”^⑫這種論述,與當時中國把文學批評當作意識形態批判的形勢形成了強烈反差,該作連同楊周翰先生翻譯的瑞查茲《文學批評原理》(1924)第32章《想象》和第34章《語言的兩種用法》、燕卜遜《含混的七種形態》(1930)第1章《論含混》等(在抗戰之前清華大學外文系和西南聯大外文系被常常提及的經典),在文革前就讓中國文壇和評論界看到英國的新批評。

有意味的是,該譯文集已經注意到新批評發展到美國階段具有不同於英國的特點。以《文藝復興批評史》(1899)、《創造性批評》(1917)以及選編《17世紀批評文選》(1908~1909)、《美國文學批評》(1924)等而著稱的著名批評家斯賓根(Joel Spingarn),1910年3月9日在哥倫比亞大學演講《新批評》,引用福樓拜曾致函友人所論“大學教授談藝術是何等可笑”,認為神父和教授不能給詩人寫傳記,青年歌德也曾呼籲“宰掉批評家那只狗”,詩人對學院派批評不滿則因批評經常離開藝術對象,“距離藝術品越遠,就是在說明自己,但一切批評都傾心於離開藝術品,以其他的去替代之”,在布瓦洛時代決定批評風尚的是男性類型批評家,在20世紀決定大學之外的文學認知的是女性批評,論述表現論、進化論,呼籲不要再理會不合時代要求的規則概念,如古典主義重視體裁劃分及喜劇或悲劇體裁分類、用道德概念衡量藝術、不理會詩歌作品的種族或時代及環境要素、不理會文學的進化論。^⑬而肯尼斯學院教師和《肯尼斯評論》首任主編蘭塞姆(John Ransom)這位以《新批評》(1951)著稱的批評家,在奠定美國新批評的又一著述《純屬思考推理的文學批評》(1941)中睿智地指出,按批評家意圖可分為心理學詩論和倫理學詩論,“倫理學批評家想把詩裡的意識形態或主題概括成意義,孤立起來討論,就不是討論詩本身”,此為倫理批評,而非文學批評。^⑭如是區分,在直接把文學意識形態化的歲月,甚至在無端抬升倫理學批評的今天,皆很有意義。該文還選從艾倫·泰特的《現代世界中的文學家》(1957)中選譯顯示出美國新批評重視文學經典之社會價值的片段,“我們享受民主制度的特權,正像我們享受其他特權一樣,以我們回報一些東西為條件。文學家為換取他的自由所給的回報,就是為其弟兄們給自由立下艱苦的榜樣,因此文學家囑咐其主人公,與他一樣享受自由,並支持文學家本身的自由。他所回報給社會的東西,經常夾帶著別的東西,那是民主社會所不喜歡的,那就是指責民主制度弊端的勇氣,尤其是分辨出那種假借民主制度之名,篡奪民主制度之實的勇氣。民主條件本身使文學家泛濫發表他所辨別的語言,即濫用選擇和目的,那些都是破壞西方國家文明的。這個事實本身是值得我們歐洲朋友們重新考慮的”^⑮。在尚未開放的時代翻譯這篇文章,的確勇氣可嘉,因為讓漢語讀者了解到美國人可以自由批評美國制

度,以及“民主”的複雜性;在 1980 年代中後期大規模引進西方文論以來,重新讀到這篇文章,也可以澄清對新批評的誤解(通常認為新批評是學院派行為,不關心社會)。新批評發展到美國階段而區別於英國的標誌,就包括把文學的認知與社會問題關聯起來。更令人欽佩的是,文選還翻譯了以《反面的陳述》(1931)和《動機修辭學》(1950)等而美國著名文學理論家肯尼斯·勃克(Kenneth Burke),其新批評力作《心理與形式》(1925)從討論《哈姆雷特》入手,論述知識心理學和形式心理學,以及戲劇中的雄辯因素如何導致憐憫、悲劇、溫柔、幽默等效果;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布拉克摩爾(Richards P. Blackmur)之《語言即姿勢》(1954),用新批評觀點討論莎士比亞戲劇《奧賽羅》等情節和詩句表達、塑造舞台形象問題;斯坦福大學英文系主任溫特(Ivor Winter)是以《原始主義和頹廢》(1943)、《廢話的剖析》(1943)、《為理性辯護》(1947)著名的詩歌批評家,其《理性辯護》(1960)論述詩歌標準,認為詩是文字藝術,以重韻律的文字表達情感,且能理性交流,表達可言說的愛情、道德。輯錄這些美國新批評,顯示出選編者的智慧、遠見,“美國新批評家在 1930 年代所取得的成就相當的顯著:他們清楚地闡明了文選評論家的工作範圍內外領域——強調文學評論不是道德說教、不是政治宏論、不是倫理綱常、不是宗教訓誡,也不是講史明志”,“指責批評家們用一整套技巧和修辭來武裝官僚和中產階級企業主,為後者的剝削和戰爭罪行制造托詞。這樣看待新批評不免太過片面”,^⑥能幫助讀者基本了解新批評的核心思想。輯錄英美新批評經典篇目,讓漢語讀者意識到,美國批評界是在建構本質上不同於英國文學的美國文學,新英格蘭情懷和清教徒偏愛道德說教,隨著新批評在美國的興起,這種承續英國的文學批評,也就被代之以美國化的專業性文學批評。

這部譯作內容豐富,還輯錄了如下文獻:(1)關於心理-精神分析的批評文獻,包括美國文學教育家弗里德曼(Melvin Friedman)的《意識流導論》(1959),論述“內心獨白”概念及其在《尤利西斯》等現代主義文學經典中的表現;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埃特蒙德·威爾遜的《創傷與巨弓》(1957),對索福克勒斯劇作《菲羅克忒忒斯:創傷與巨弓》(1941)進行精神分析;哈里森(Jane Harrison)曾在劍橋大學從事俄國文學教學和研究工作,其《藝術與形式》(1927)結合俄國文學藝術和東正教之關係的案例,論述宗教之於藝術形式的心理作用問題;澳大利亞裔美國學者莫雷(Gilbert Murray)之《古典詩歌傳統》的《哈姆雷特與俄羅斯泰亞》(1914),對經典進行心理-精神分析;那位英國批評家博德金《詩歌的原始模型》(1934)第一章“悲劇詩歌中的原始模型”,用榮格《分析心理學與詩歌藝術之關係》細致地分析古希臘悲劇特點;弗格森(Francis Fergusson)《俄狄浦斯王:悲劇的行動旋律》(1948)運用弗洛伊德學說論述這部古希臘悲劇;菲爾拉特(Philip Whelwright)《神話宇宙觀》(1954)對神話批評的闡釋。(2)反思文學批評本身的若干經典:以《批評與 19 世紀》(1951)而著名的倫敦大學教授蒂洛森(Geoffrey Tillotson),其《談批評家與年月無誤的文本問題》(1960)多番論述批評家在歷史和文學知識上的要求、對文本的嚴肅態度;芝加哥學派奠基人奧爾森(Elder Olson)《詩歌理論提綱》(1949),運用亞里士多德的古典詩學方法討論現代詩歌及其功用的可能性問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勒夫喬(Arthur Lovejoy)之《樂觀主義和浪漫主義》(1927)等等從人文主義文學批評角度探討批評方法之作。(3)實用主義文學批評經典,即杜威(John Dewey)之《藝術即經驗》(1934)第 6 章《內容與形式》,論述內容和形式不可分,否則,“藝術中的虛偽不僅有道德根源,也有美學根源,哪裡把內容與形式分開,哪裡就有虛偽”、“形式與內容在經驗中相結合的最後根源,既然是生物與自然和人的世界彼此作用中的感受、行為的親密關係,那麼那些把內容和形式分開的理論,最終根源則是忽略這種關係”。^⑦(4)福斯特《論小說人物》、伍爾夫《班奈特先生和勃朗太太》、帕西勒伯克《論小說描寫的角度》等經典作家的文學評論,在把現

代主義當作反映資本主義“頹廢”證據的歲月，翻譯現代主義批評經典。

這部理論文選的價值還在於，針對當時中國盛行蘇聯馬列主義的極左狀況，選譯了諸多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篇什。首先是從埃德蒙·威爾遜《三重思想家》(1939)中節選出“馬克思主義與文學”；該作聲稱，“馬克思恩格斯不像他們的追隨者，從不企圖提供可以用來檢驗藝術作品真實性的社會經濟公式。他們成長於歌德的晚年時代，當時偉大的德國文學時代尚未過去，而且他們年輕時都想成為詩人，他們對文學作品的感受首先是其藝術價值”，“沒有文學能力的左翼批評家，往往企圖以在那個領域內無效的標準來衡量文學作品。他所喜愛的工作之一就是發號施令，為創造理想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制定圖式。這樣的公式當然完全沒有任何價值了”；由此否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說，“為未來藝術下命令的那些人，通常總是珍愛過去的某些偉大人物，認為這些偉大人物滿足了他們的某些條件，往往把這些人物提出來證明現在的文學如何相形見绌。因為從來沒有過一個偉大作家真正與這些批評家的文學觀念有任何共同之處，所以他們不得不憑借想象來說明他們理想的偉大作家是什麼樣子。人道主義者有的是索福克勒斯和莎士比亞，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者有的是托爾斯泰。但可以肯定，假如托爾斯泰按那些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者提出的目標和禁令行事，他就永遠寫不出一章小說來；假如白璧德和摩爾能強迫莎士比亞接受其道德、美學的指令，那他就會連一行十四行詩也寫不出來”；反對左翼人士所主張的，即革命時期或革命前期適宜於產生新的充滿生命力的文學形式，“在真正進行革命時，這是很少有的事情。最高度發展的文學形式，要求有閒暇時間和一定程度上的安定，在革命時期，作家通常是兩者都做不到……產生偉大作品的條件顯然不是正在逼近的革命，而是這樣的一種現象：在任何一個從有力建立起的一套制度中汲取力量的作家，掌握高度發展的文學技巧。他可能反映過渡時代，但要說他不偏不倚地面向未來，就未必合乎事實”。^⑧當時敢翻譯出如此深刻批評蘇聯官方文學及理論的論述，可見主編的智慧和勇氣。同樣令人欽佩的還有：《黨派評論》編輯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ips)和烏克蘭裔僑民美國批評家菲利普·拉夫(Philip Rahv)合作的《私人經驗與公眾哲學》(1936)，它坦言“‘自由的個人的說明’和‘私人經驗’是詩歌所必不可少的，這條顯而易見的道理，少有批評家懷疑”；^⑨哥倫比亞大學教師伊士曼(Max Eastman)之《文學家的心靈》(1932)中的《論對晦澀的崇拜》，用大量案例說明現代主義詩歌雖充滿著諷刺、模擬、晦澀，但“它是全世界寫得最真誠最自然的東西”，夾雜著天真的樸實，也是拿社會交流的工具作為材料的。這些篇什顯示出，馬克思主義批評遠非只有蘇聯那種僵化的論述，還有不同於科學主義的批評，它在靈動的表述中揭示出文學的微妙、複雜性。這樣的篇目表明選編者的智慧非凡。

可以說，中國首次比較系統地觸及 20 世紀歐美文學批評，不少篇什堪稱文論經典，這對當時中國的文學及研究界來說，宛如天外來客。它作為中蘇開始走向分裂、中國嘗試擴大世界範圍的產物，不是孤立現象：除上述朱光潛和伍蠡甫等等譯作和著作問世，還有 1958 年三聯書店刊行宋桂煌翻譯羅伯遜(Archibald Robertson)之《基督教的起源》(1954)，1959 年英國著名批評家里德爵士訪問中國，1962 年商務印書館刊行暨南大學歷史系教授朱傑勤翻譯德國學者利奇溫(Adolf Reichwein)《十八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的接觸》(1923)，積極介紹歐洲的巴洛克、啟蒙主義、感傷主義等時代對中國審美經驗的好感。與這些對歐美文學文論和文化的短暫接觸之態勢的是，中國也嘗試重視自身文學批評遺產和審美傳統：新中國建立十年的十大建築——從設計到結構皆為蘇式的，但建築過程中蘇關係暗潮湧動，於是改用國畫而非蘇聯油畫裝飾十大建築內部的奇觀——人民大會堂裡有傅抱石和關山月的《江山如此多嬌》；1958 年 3 月 22 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和漢口會議上發

表搜集民歌和創作民歌的指示,《人民日報》隨之發表《大規模地收集全國民歌》(4月14日)社論,周揚八大二次會議(1958年5月)上發表《新民歌開闢了詩歌的新道路》,中國由此出現了新民歌運動即“大躍進民歌運動”;朱東潤於1961年3月受教育部大學文科教材會議之邀,主編《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並於次年在復旦大學中文系編訂成功。

三

然而,雖然因蘇聯內部政治生態變化而波及蘇美關係,在中國發生了臨時的策略性接觸“西方”,但整體情勢如中蘇論戰更多是借用斯大林體制下的列寧主義去反駁赫魯曉夫的解凍話語,而未能超越冷戰思維,更未能重新認真研究“西方”概念。如此情勢導致,中國無法充分關注從歐洲文學批評向美國主導的西方文論之轉化的情勢,不清楚哈佛大學教授巴特(Walter Bate)如何積極面對文學理論替代文學批評實踐之態勢而主編的《文學批評重要文本》(1952),從而使這部“文選”在直觀上保持當時中國的印記,而非與美國學界同步;誤把蘇格蘭文學史家和批評家戴啟思(David Daiches)之《文學與社會》(1938)當作馬克思主義批評,忽視了其《詩歌裡的意義位置》(1935)、《新文學價值:現代文學研究》(1936)、《文學的批評方法》(1956)、《英國文學批評史》(1960)、《小說與現代世界》(1960)等更有價值的著述;“文選”近三分之一篇幅討論的是無產階級文學,如節選卡爾佛登《美國文學的解放》(1932)第七章強調美國文學之民主傾向,牛津大學教授和偵探小說家路易斯(Cecil Lewis)《革命者與詩歌》(1935)討論共產黨人如何對待詩歌、詩歌對革命的意義等問題,英國詩人和批評家斯本德(Stephen Spender)爵士《破壞性因素》(1938)第13章《作家與宣言》討論共產黨作家和無產階級文學,等等,——從文學批評史上看來,諸如此類篇什僅有文獻價值,學術意義甚少,更有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的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1923)、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啟蒙辯證法》(1947)、梅洛-龐蒂《辯證法的歷險》(1955)等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經典則被忽略。其他更嚴重問題也就相隨而生:

正如當時中國基本上不清楚蘇聯文藝學乃蘇共建構促成蘇聯人乃至第三世界和西方左翼認同蘇聯及其制度、懷疑歐美價值觀、召喚全球反西方的話語之一,對歐洲文學批評在冷戰時代轉型為西方理論及其真相也茫然無知。二戰後,歐美要應對包括意識形態在內的蘇聯全方位威脅,聯合成“西方”要建立所謂普世性的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法學等,也使戰前歐洲各國有民族特色的文學批評,發生了向去民族經驗的理論化探索轉型之態勢,但不同於蘇聯以體制方式、在維護反映論的框架下進行文藝學研究,而是通過學院制度和大學知識創新氛圍(基金會支持和課程體系創新),自由探索出一套又一套科學化的文學批評方法,其學說本身巧妙地把政治正確掩飾得不見蹤影,從而在話語層面具有相對的普世性,這就是密歇根大學教授希伯斯在冷戰結束伊始刊行的《冷戰文學批評與懷疑主義政治學》(1993)所說的,“更有爭議的是,哪怕不是很重要,現代批評進程一直被冷戰強有力地影響著,這樣的觀念性文學批評史從未對這種影響進行任何形式地查考”。^④這樣一來,這部文選完全錯失了20世紀歐美文學批評和西方文論發展的諸多特別重要論著、事件:

第一,標誌歐洲文學批評從實踐向理論轉型的哥廷根大學教授凱塞爾(Wolfgang Kayser)《語言的藝術作品:文藝學引論》(1948年初版、1956年再版),率先系統論述如何認識作為純文學的語言藝術——文學之意義是不再涉及作為現實的事實的,只創造出其自身的客觀性,文學作品研究即語言學的一部分。之於反映論,如此論述足以讓人新奇,由此曾是戰國策派成員留德海歸的南京大學教授陳銓1965年曾開始翻譯該作(誤以為作者是瑞士理論家),但直到1984年才得以問世——

譯者已去世 15 年矣！

第二，標誌文學批評實踐以大學教材方式普及理論化形態的新批評之作韋勒克和沃倫《文學理論》(1949)。二戰前(1939)就從捷克移民到美國的韋勒克(René Wellek)，在任教於愛荷華大學英文系期間，和沃倫(Austin Warren)同事近七年，基於分別教授文學批評課程，對蘇俄反映論有深切感觸，便合作著述《文學理論》(1949)，用新批評方法把學術的“文學研究”稱之為文學理論——超乎個人意義的知識、識見和判斷，類似於蘇聯把“文學研究”(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視為比文學史和文學批評更重要的“文學理論”(тео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但它否定反映論，對文學進行科學化的內部研究、外部研究。這種科學化的體系性研究，飽受爭議，卻未妨礙繼續被耶魯大學當作教材使用(1946年他轉任耶魯大學並創建比較文學系)，美國其他大學英文系和比較文學系隨後也採納其為教材，它隨之被譯成法、德、意等語言，從而促成歐洲文學批評轉化為西方文學理論。

第三，促成歐洲文學批評實踐轉化為體系化理論並被廣泛接受的，更在於發現蘇聯所排斥的俄羅斯形式主義批評。猶太裔俄僑雅克布遜(Роман Якобсон)在莫斯科大學歷史語文系上學期間就組建了莫斯科語言小組，1949年他開始任職哈佛大學到退休(1967)。正是這位形式主義當事者，指導了出生於彼得格勒的波蘭裔猶太人埃里赫(Victor Erlich)，後者推出《俄羅斯形式主義：歷史與理論》(1955)這部系統論述形式主義在俄蘇的歷史和基本詩學之作，很快影響歐美文論界：整理俄羅斯形式主義遺產並把它與歐美文學關聯起來，迅速成勢，從而加劇了符號學在法國問世、巴赫金遺產在法國的發掘，但中國知道這一真相已經是 1980 年代中後期。

第四，一戰之後就出現、二戰後再度復興的存在主義、現象學批評，從海德格爾到薩特等人對文學的討論，是和科學主義批評並行的人文主義文學批評，不僅顯示出文學認知的非學院化成為可能，而且讓人在戰亂摧毀人們對歐洲信心的境遇中看到人存在的希望、問題。

第五，在缺乏對歐美文學批評進行切實研究的格局中輯譯某些篇章，導致文選中不少作者之更重要著述被錯失，如白璧德《文學與美國大學》(1908)、《現代法國文學批評大師》(1912)、《盧梭與浪漫主義》(1919)、《論創造性》(1932)等；馬克里希的《美國觀點和戰爭》(1942)、《藝術教育和創造過程》(1954)、《詩歌與經驗》(1961)等重要批評之作；扎貝爾的《技術與人物性格：現代小說中的文本、方法、使命》(1957)；海曼的《全副武裝的幻象：現代文學批評的方法研究》(1952)是其重要批評遺產；蘭克更重要著述乃《批評家和批評》(1952)、《批評的語言和詩歌結構》(1953)，就如同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講座教授列文更重要的著述是《批評的若干視角》(1950)、《象徵主義和小說》(1956)和《批評的若干語境》(1957)，等等。而且，輯錄中缺失了諸多更重要的西方文論經典之外，還對所翻譯的若干篇什產生意識形態的誤解，如希克斯是 1930 年代美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1939 年《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之簽署，就擊碎了他的信仰，宣稱自己是民主社會主義者，甚至為《國家》周刊撰文《失敗的馬克思主義》。

中蘇分裂帶來的不是促請中國嚴肅觸及“共產主義”和“帝國主義”、“東方”和“西方”等蘇俄/美國建構的宏大概念及其實質(冷戰話語)，僅是使中國高層和文藝理論界策略性地接觸西方，就導致該譯文集完全沒有產生石破天驚之效應，而是淹沒於人民文學或人民出版社刊行、曹葆華翻譯的米·里夫希茨編的四卷本《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1960~1966)、戈賓權等譯日丹諾夫《論文學與藝術》(1958)等等大量譯作中；同時，並未對當時和此後文藝學教材建設產生切實影響。1958 年開始編纂大學文庫教材雖然關注到中國民間文化，減少蘇聯因素，卻未帶來編纂水平的同步增長：1960 年 10 月中央書記處舉行關於高校文科教材專門會議，1961 年 4 月確定包括中文、歷史、哲學

和教育、外語等在內的七個文科專業,以及戲劇、音樂、電影和美術、舞蹈等七個藝術專業,224門課程、297種教材。在這樣的格局中,以群主編了第一部中國統編教材《文學的基本原理》(1961年5月開始編寫,1963年2月、1964年8月出版上、下冊),蔡儀主編另一部統編教材《文學概論》(1961年5月啟動,兩年後形成討論稿,1978年修訂稿,1979年刊行),以毛澤東《講話》替代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但教材結構和核心仍是蘇聯文論。期間,新民歌運動很快就“無疾而終”,完全不能媲美於18~19世紀之交歐洲浪漫主義運動——通過發掘各自民間文學藝術促成民眾認同自身民族文化。而1954年教育部直接聘請基輔大學語言文學系文學批評課教師畢達科夫,為北京大學文藝理論研究生班講授文藝理論(1954.4~1957.4),並據其講稿而成書《文藝學引論》,通過授課和教材波及全國,雖然中國連對其身份也不甚清楚的蘇聯普通教師(學員們多誤以為他是列寧格勒大學副教授),借馬列文論之名、以專家身份給中國堂而皇之地灌輸庸俗社會學、敵視西方和排斥中國,1957年之後它與維諾格拉多夫《新文學教程》再版本(1952)和查良錚翻譯的莫斯科大學教授季莫菲耶夫《文學原理》(1934年初版、1948年再版,1953年漢譯本)、北京師範大學蘇聯專家科爾尊的《文學概論》(蘇聯文學研究班的講稿)等一道,繼續主導著中國的文藝學。反右之前,蘇俄理論立即取代民國年代盛行的歐洲文學批評方法,在反右之後未根本性改觀,《文學的基本知識》、《文藝學概論》等近乎雷同的“著述”層出不窮。進而,中國在難以認清自身文學批評傳統的同時,更失去了了解歐洲文學批評如何轉化為西方文論之大勢的機會。

西方文論和文化如不速之客般光臨急需新思想解放的中國,卻未驚醒中國注意到蘇聯文論嚴重忽視中國的不足,解凍思潮之後蘇聯文學理論的積極變化也未作用於中國的文學批評,並且這種反差不是文學批評界不敏感所致。正如中蘇分裂之於蘇聯的影響是局部的(因為蘇聯要緩和與西方冷戰,通過降低國際共產主義陣營反西方之力度,以贏得美國和歐洲信任、實現蘇共利益最大化),對中國而言是全局的(全方位備戰,把整個中國劃分為一、二、三線),卻沒有正面改變中國那樣:中國仍囿於國際共運內部之爭,爭論過程雖強調走中國路,結果卻加劇斯大林模式在中國的形成。如斯大林斥責南斯拉夫走自己社會主義道路為民族共產主義,赫魯曉夫轉而讚賞這是“具體的社會主義建設”,而中國則比斯大林更甚地認為,南斯拉夫已不是社會主義國家。這樣一來,中蘇分裂不是促使中國重建“西方”概念,而是更加教條主義地對待列寧的“帝國主義論”,不顧美蘇緩和冷戰的趨勢及全球意義,林彪發表《人民戰爭勝利萬歲》(1965年)、《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資本主義道路》(1967年)等,強調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走向滅亡、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走向勝利,並突出“中國革命中心論”。在如此局勢下,更遑論促使中國重新檢討移植蘇俄的“西方”概念並融入西方,進而我們也就能理解,在有限接觸西方的過程中,把黨內高層鬥爭擴展到教育界和全社會,即反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文革,是在遵循蘇聯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概念下展開的。

在這樣的情勢中,雖有上述極少數學者能幸運接觸西方文論,但結果不能產生任何切實的作用,也就在情理中了。伍蠡甫譯作《文學批評中的神話和原型學派》(1964)幾乎沒產生任何影響(連一次引用也沒有),他本人直到1981年之後才重新發表西方文學批評之作。1944年,葉君健以其出色的英文能力受英國戰時宣傳部之邀,在英國向倫敦《新作品》、紐約《小說》月刊、蘇聯《國際文學》等撰文介紹國際反法西斯戰場的情況,翌年被推薦到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研究歐洲文學(1949年11月回國),回國後他未涉足文學批評領域,多是寫詩和翻譯。著名宗教學家趙紫宸之女趙蕓蕓,畢業於燕京大學英文系(1932)和清華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1935),應戴望舒之邀翻譯艾略特

《荒原》(先刊於雜誌《新詩》,1937年上海新詩出版社刊行),1944年丈夫陳夢家受費正清推薦,獲芝加哥大學東亞系古文字教授職位,她也隨即在該校英文系攻讀博士學位,此時正值文學批評芝加哥學派形成之際,以研究詹姆斯為題的論文《〈鴿翼〉源流考》獲芝大哲學博士學位(1948),1949年回燕京大學西語系任教授並兼系主任,很快地,她全家飽受政治衝擊,她本人在西方文論譯介和研究上一無所成。同在芝加哥大學英文系留學的周珏良、巫寧坤、穆旦回國不久同樣遭受政治摧殘,在西方文論譯介上乏善可陳。穆旦因接觸英國浪漫主義和歐美現代派詩歌而成為現代主義詩人,1949年8月自費赴芝加哥大學英文系留學,1952年獲文學碩士學位,回國後任南開大學外文系副教授,翻譯英美和俄國浪漫主義詩歌,5年後被定為歷史反革命,連詩歌翻譯和創作也被迫停止,幾乎沒有機會對現代主義和文學批評展開切實研究。“新月派”現代主義詩人卞之琳1947~1949年曾在牛津大學從事英國文學研究,1960年代同樣沒有發表任何西方文論之作。1947~1949年10月在索邦大學法文系留學的王道乾,除翻譯法國小說之外,沒有對法國文論譯介和研究做出任何貢獻……而這些又是當時海歸的普遍歸宿,除錢學森等極少人士之外,包括哈佛大學博士(1923)葉企孫等在內,在1957年之後個人和家庭命運多舛,在學術上更是微不足道,對1940年代末以來歐洲文學批評轉化為文學理論及其趨勢、學說、學科觸及甚少。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展,尤其是1966年文革到來後,更是對期間西方文論方興未艾的情形則完全不會顧及,連袁可嘉本人在《“新批評派”述評》(《文學評論》1962年第2期)和《略論美英“現代派”詩歌》(《文學評論》1963年第3期)之後,也無緣再續西方文論的翻譯和研究,直到1979年才發表《解構主義文學理論述評》;相應的,對那位著名文學批評家戴啟思在其後諸多重要的論著,如《企鵝英國和英聯邦文學指南》(1971)、與友人合編的六卷本《文學與西方文明》、《上帝與詩人》(1984)等自然不會在意。在諸如此類痛心疾首事件面前,更遑論與奧克拉荷馬大學英文系講座教授里奇(Vincent B. Leitch)主編的《諾頓文學批評和理論選讀》(2001)及其修訂版(2010)特別在意冷戰時代文學批評方法探索,嚴肅又系統地提供大量已被世界各國文學批評界廣泛採用的成果。

總之,1957~1964年西方文論成為中國的不速之客,完全是因蘇聯調整其冷戰策略和內部改革的意外所得,非中國嚴肅研究西方文論後對其真誠歡迎之成果,又因中國對冷戰局勢認識不清、無法超越“國際共產主義”框架,這次短暫接觸未產生任何實際效益,且很快無蹤地消失於中國,直到改革開放之大勢後才再度做客中國。自此,戰後理論化的西方文學批評作為冷戰的產物,雖然不足和成就並存,即西方文論原本也是針對蘇聯反映論的話語行為,但因採用學院制度探索文學批評方法,意外獲得超越冷戰話語的學術價值。改革開放以來,無論中國內部局勢或國際格局發生怎樣變化,也無法阻擋中國去蘇俄意識形態的努力、決心,正如小平同志說“社會主義究竟是個什麼樣子,蘇聯搞了很多年,也並沒有搞清楚”,^①主張放棄姓社姓資之爭,外加冷戰以蘇聯解體而結束的這一龐大事實已證實,包括反映論在內的蘇聯理論是失敗的,而西方理論則在後冷戰情勢中不失時機地調整為“後理論”,從而持續勃發出新的生命力,對此我們更需冷靜痛定思痛地對待反右展開過程中譯介西方文論的史實。

①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談話》,北京:新華出版社,1992年,第126頁。

②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

錄》(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350頁;

《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

第603頁。

- ③《赫魯曉夫回憶錄》第3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465頁。
- ④不否認，1949年8月5日杜魯門發表美中關係的白皮書，新華社發表6篇評論，其中毛澤東的《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別了，司徒雷登》等徹底否定美國對中國的貢獻。事實上，早年毛澤東《湖南改造促成會復會書》（1920年6月23日）、《絕對贊成“湖南門羅主義”》（《大公報》1920年9月4日）就仿照美國“門羅主義”（門羅總統在1823年提出的“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以反對歐洲列強干預西半球事務），主張湖南最好是保障自治，“湘人自決主義者，門羅主義也”（《毛澤東早期文稿》，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511頁）。巴黎和會上威爾遜總統未顧及中國利益，華盛頓會議通過《九國公約》，以美國提出的“各國在華機會均等”和“中國門戶開放”為基礎，使各列強支持不同軍閥而加劇中國動蕩等，毛澤東對美國精神失望轉向蘇俄道路。但隨著日本大規模侵略中國，在瓦塞堡會議確定蘇美英等與日本為敵的“友邦”後，毛澤東那被蘇俄道路觀所替代的美國精神開始復蘇，主張和民主國家建立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切實參加反法西斯戰爭，延安和美國關係大為改善，如斯諾等美國記者和美國軍事代表團訪問延安，1944年7月4日延安舉行慶祝美國建國168周年招待會，招待美國僑民和中外記者團，會後毛澤東和朱德等出席慶祝晚會。
- ⑤佛克馬：《中國文學與蘇聯的影響（1956-1960）》，季進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57頁。
- ⑥吳冷西：《十年論戰》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272頁、第248頁。
- 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紀念文集》（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3頁、第76~77頁、第81頁。
- ⑧繆俊傑：《周揚與中國式的文藝批評》，《憶周揚》，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19~320頁。
- ⑨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西方文學所編：《現代美英資產階級文藝理論文選》（下），北京：作家出版社，1962年，第465~466頁。
- ⑩艾略特：《文學與現代世界》，曹葆華譯，見中國科學

- 院文學研究所西方文學所編：《現代美英資產階級文藝理論文選》（上），第73頁、第78頁。
- ⑪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西方文學所編：《現代美英資產階級文藝理論文選》（下），第321~322頁。
- ⑫利維斯：《文學與社會》，徐育新譯，見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西方文學所編：《現代美英資產階級文藝理論文選》（上），第127~128頁。
- ⑬斯賓根：《新批評》，黃星圻譯，見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西方文學所編：《現代美英資產階級文藝理論文選》（下），第339~360頁。
- ⑭蘭塞姆：《純屬思考推理的文學批評》，張谷若譯，見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西方文學所編：《現代美英資產階級文藝理論文選》（上），第140頁。
- ⑮艾倫泰特：《現代世界中的文學家》，劉若端譯，見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西方文學所編：《現代美英資產階級文藝理論文選》（上），第171頁。
- ⑯薩克文伯科維奇主編：《美國文學史》第5卷，馬銳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第351頁。
- ⑰杜威：《內容與形式》，徐育新譯，見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西方文學所編：《現代美英資產階級文藝理論文選》（下），第384頁、第390頁。
- ⑱威爾遜：《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楊宇譯，見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西方文學所編：《現代美英資產階級文藝理論文選》（下），第108頁、第119~120頁、第123頁。
- ⑲拉夫：《私人經驗與公眾哲學》，徐育新譯，見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西方文學所編：《現代美英資產階級文藝理論文選》（下），第127頁。
- ⑳Tobin Siebers, *Cold War Criticism and the Politics of Skeptic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30.
- ㉑《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39頁。

作者簡介：林精華，首都師範大學燕京學者，安徽大學至誠講席教授，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北京市教委特聘教授。北京 100089

[責任編輯 桑海]